

河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回忆冯玉祥将军	宋聿修 (1)
冯督接印安民两布告	原载《新豫日报》(58)
附：财政厅厅长薛笃弼到任之演说词	(58)
西北国民革命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经过	张振江遗稿 (60)
冯玉祥在河南组织民团军的情况	张振江遗稿 (63)
冯玉祥主豫措施	段再丕 王竹亭 葛天民 (65)
冯玉祥主豫期间省会纪闻	申桐生等回忆 王华农整理 (91)
一九二八年宁陵县的县政改革	高步陶 (96)
开封训政学院简述	路庭训 (99)
记冯玉祥的几次讲话	王竹亭 肖凤桂 (103)
来稿摘编 (据康永奇等稿)	编 者 (109)
我所知道的吉鸿昌	赵健欣遗稿 (112)
吉鸿昌将军在甘肃	刘大有收集整理 (118)
附：吉鸿昌颂 (甘肃民谣)	雷和收集 (128)
吉鸿昌夜袭临潼	郝成章 (130)
吉鸿昌轶事二则	王仲成 郭定庵 杨景霏 (132)
黄樵松烈士在抗战时期	宋聿修 (135)
我所知道的王铁珊	丁展成 (145)
豫东扶、太、通、杞四县边区的“抗除游击队”	张宗衡 (148)
刘基炎自传	(153)

刘积学自传	(160)
刘纯仁事略	任芝铭遗稿 (165)
马云卿传略	马有甫等 (167)
任镜海自传	(172)
王天纵在鄂西	贺觉非 (179)
海廷璧事略	海绍昌 (181)
沈竹白事略	沈毅 沈达 (183)
时敏行小传	(187)
仁义会会员刘步云事迹	李春泉 (189)
关于二次革命的回忆	徐廷麟遗稿 (191)
张镇芳屠杀河南革命党人之惨剧徐乐三等回忆 尹文堂等整理	(194)
记长寿老人唐道成	王炳亮 (198)
〔 补充 · 订正 〕	
对《樊钟秀和建国豫军》一文的补充	编者整理 (214)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河南省 日伪政权负责人更迭情况	邢汉三 (230)

回忆冯玉祥将军

宋 聿 修

冯玉祥将军是一八八二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诞生的，距今已一百周年。我是他的学生，又直接在他的左右工作多年，当此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回忆他的举止和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如在目前。现就记忆所及，略叙如下：

一、我是怎样投入冯将军的队伍的

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我在故乡河北省（那时叫直隶省）枣强县县立高小读书时，常听体操老师王福仓（字子裕）讲：中国的军队，大多数纪律很坏，将领也腐败无能。只有冯玉祥率领的第十六混成旅，注重训练，纪律严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因祖父在张家口做生意，我随他到张家口，考入了察哈尔第一中学；到一九二四年毕业。在这期间，冯将军任陆军检阅使，直接管辖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驻在北京和通州一带。那时，常听人说起冯将军的部队，都认为颇有一番朝气。特别是一九二三年秋季永定河决口时，冯将军的部队奋力抢险复堤，整治河道，赢得群众的一致赞扬。这更增进了我对冯将军及其部队的仰慕。

一九二四年夏天，我在察哈尔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部继续求学。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北京人心惶惶不安。一天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看到每个街口都站有服

装整齐的士兵，个个臂缠红袖章，袖章上钉有一块圆形白布，上写“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十个字。那些士兵态度和气，对一般过往行人也不盘问。到校之后，同学们纷纷议论，都认为发生了什么变故。过了一会儿，报纸来了，才知道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倒了贿选总统曹锟，组成了国民军，并提出反对内战，和平统一，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等主张；接着又把溥仪赶出皇宫。这次政变，冯将军把它称为“首都革命”。

一九二四年冬天，由于外蒙古宣布独立，逐渐断绝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我祖父和父亲经营的生意亏累甚多，我不得已退学返回张家口，住在父亲的铺子里。大约在这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张家口驻军第四混成旅突然哗变，一时枪声不绝，变兵到处抢掠放火，张家口大街上的所有商店几乎都被抢劫。我父亲的铺子在大境门外的西沟里，幸而未被波及。这主要是因为数月没有发饷，已届隆冬，尚未发下棉衣，因而激起兵变。

兵变之后，段祺瑞政府立即把察哈尔都统张锡元和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金标撤职，以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继任都统。张之江率部到张家口就职，那时张锡元和张金标已避往别地。张之江首先按照冯将军的命令，把第四混成旅的团长、团附、营长等统统枪毙，然后把其余官兵缴械遣散，声称用铁闷子火车送回原籍。但当火车开出张家口车站后，又停车检查，无论官兵，凡带有抢来的衣物、金银首饰或带有较多钱财的，一律押到张家口通桥南边的河滩里枪决，其余的放走。据说那次枪毙的约有四、五百人。当时虽然人们觉得杀人过多，但对冯将军及其部队的嫉恶如仇精神，还是颇为赞许的。

第七混成旅开到张家口后，人们看到该旅士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精神饱满，穿的灰粗布军装干干净净，队伍走在街上，一不打鼓，二不吹号，而是高唱军歌。士兵上街买东西，态度和气，买卖公平。这一切使张家口市民耳目为之一新，都说从

来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一九二五年初，我到察哈尔沽源县县立高小当教员。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我觉得帝国主义欺人太甚，有志青年应该直接投身于反帝救国的行列。恰好这时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在张家口创办一所察哈尔初级陆军干部学校，通知各县选送中学毕业生前往投考。沽源县长李平林说高小教员中有愿去投考者，他可以保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投笔从戎机会，便拿着县公署的保送公函，回到张家口报考。

这时候冯将军已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原绥远都统马福祥调为西北边防会办，所遗绥远都统一职由冯部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继任。不久段祺瑞政府又发表冯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冯派所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率该师前往兰州。这样，冯将军就有了京兆、察哈尔、绥远、甘肃几个地方的地盘，军队也扩充到十五万人左右。

冯到张家口后，知道张之江正在筹办一个察哈尔陆军初级干部学校，决定把这个学校改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改名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并在张家口、北京两地公开招生。这时正当“五卅”惨案之后，青年学生反帝爱国情绪高涨，愿意投笔从戎者颇多，所以很快就招够了六百多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学毕业生，还有一部分是大专学校毕业或肄业的。我是在张家口被录取的，发榜后就入学，从此成了冯将军部下的一名军人。

二、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

一九二五年七月间，被录取的学生陆续来校报到，共编成三个步兵队，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团。当时的校长是陈琢如，教育长是陈凤韶，他二人都是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的。各科教官和队长也都是陆大或军官学校毕业的。那时保定军

官学校已经停办，陈琢如等想把这个学校办成保定军校那个样子。但冯玉祥觉得办那样的学校，不尽符合西北军对于干部的要求，所以不久就由各部队挑选了一批军官来担任队长和分队长，把正式军事学校毕业人员一律改为教官。从此，这个学校的教育、训练就完全纳入了西北军的传统轨道。

约在这年八月上旬，这个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地点是在都统署南边的基督教礼拜堂。主席台上悬挂着一条极为醒目的横幅，上写“上帝临汝，勿二尔心”八个大字，可见当时西北军的基督教气氛是很浓厚的。冯将军偕同夫人李德全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张之江等高级将领也出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冯玉祥。他那天穿着一身蓝布制服，和现在的中山服相似，头戴白色盔帽，足穿布鞋。他给我的印象是身体魁梧，神态威严，是个标准的军人。会上冯将军首先讲话，大意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抱着救国救民的志愿，参加我们西北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同学们勤学苦练，在吃苦耐劳上狠下功夫，取得优异的成绩。等语。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富有感情，同学们听了深受感动。接着李德全也讲了话，她对同学们投笔从戎表示欢迎和赞许。

举行开学典礼之后，冯玉祥将军规定，干部学校每星期要有两次把全体学生带到督办署附近空地，由他亲自进行教育训练。记得第一次是他亲自教唱《新兵歌》，歌词是：“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护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衣民脂，尔尽知民间困苦；重勤俭，重品行，不可忘保护商民。”他说：“这首歌很重要，新兵入伍后首先要学会，这样才能对百姓的疾苦念念不忘。”又说：“新兵两个字，不只是指新入伍的兵而言，入伍多年的兵也应该自认为是个新兵。我自己就仍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新兵，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朝气，才会坚持勤学苦练，不断进步。”

有一次是他亲自教授“身法”、“步法”和“枪法”。所谓身法，就是操典上的“立正姿势”，但他所要求的与操典规定不尽相同。例如操典上规定“两目张开，向前平视”，他则要求两眼瞪的越大越好。又如操典要求身体直立，他则要求“拿身法”，胸部尽力向前扩张，腹部尽力向内收缩，他说这样才能显得精神。关于步法，当时操典规定常步、正步都是每步七十五公分。他说那是完全从日本操典照搬过来的，是喝了洋药水的操典。日本人一般个子较矮，所以规定每步七十五公分，中国人个子较大，应该规定八十公分。至于正步走，他主张先把腿抬平，然后伸出去落地，这样才显得整齐好看。枪法就是托枪和举枪的动作，他主张既要快又要用力，枪到手里要叭叭作响，他说这样才显得整齐。以上动作他都一一反复示范，然后令各队学生带开练习，他亲自到各班去检查纠正。

有一次他亲自教唱西北军的“三大军歌”，就是《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和《利用地物歌》。这是把单人战斗的动作和要领，以歌曲形式表达出来，使士兵易懂易记。他教唱之后，就叫跟随他的卫队旅长冯治安作示范表演，由他亲自发口令，出情况（军事训练术语，意谓假设出现某种情况），冯治安随着他的指示就地摸爬滚打，学生们观看。然后各队带开，按照示范的样子演练。

有一次，他对同学们专讲带兵的方法。他说：“带兵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与士兵同甘共苦。古人有‘三礼二要’的说法。所谓‘三礼’，就是‘冬不服裘，夏不挥扇，雨不张盖’。这是说如果士兵冬天没有皮袄穿，当官的也不应穿皮袄；夏天如士兵没有扇子，当官的也不应扇扇子；下雨天士兵如果没有雨伞，当官的也不应该打伞。但是如果士兵都有皮袄，有扇子，有雨伞，当官的当然也可以用了。所谓‘二要’，就是‘兵未入室，将不敢入舍；兵食未熟，将不敢就食。’这是指行军作战的时候，如果到了宿

营地，在士兵还未进房休息之时，当官的不能先进房休息；在士兵的饭还未做好时，当官的不能先吃饭。你们现在是干部学校学生，将来都是要当军官的，对于带兵方法必须好好研究。古人说：‘带兵如带火，不戢则自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你们要经常警惕自己。”

还有一次是叫我们看手枪团的体操表演。所谓体操，主要是攀杠子（单杠）；每个官兵至少要会三大套，即曲身上、摇动转回、倒立下这三个动作。少数人还会打反正把车轮和倒踢下等项动作。表演以后，他对我们讲话说：这种体操对军人来说非常重要，可以强壮身体，增加臂力，将来到战场上定能显出威力。后来我们才知道西北军官兵升级考试，攀杠子都是必考科目。有的同学曾戏作一副对联：“攀杠子举大顶前程远大，拿身法瞪眼睛后生可畏。”

冯每次亲自教育训练的时候，都是把午饭送到操场，和学生们一起吃。在吃饭之前，他先领着唱《吃饭歌》，当时的歌词是：“粒粒辛苦，来处不易；民膏民脂，感谢主赐。历年国耻，饮忍苦痛；复仇雪耻，万死不辞。”有一次他在步兵第一队，给他盛的大米饭中吃出砂子，饭后他把全体学生集合起来，亲自把队长孙长坡打了几十军棍，然后发表讲话。他说：“石砂子吃到腹内，很可能掉到盲肠里去，那就会得盲肠炎，必须动大手术，甚至造成死亡。这些同学们抱着很高的爱国热情，到我们部队里来。你们这些队长对他们的生活不负责任，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这是不能容许的。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我还要从重处罚。”同学们听了以后，对他的关心爱护，都很感动。但对一个校级军官，当众被按倒打军棍，也有些看不惯。

冯这样亲自教育训练了约有一个多月，因为他工作很忙，还不断到外地视察，以后没有再继续下去。经过这段训练，同学们对他总的看法是：他练兵的经验很丰富，工作细致认真，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做事针针见血，一步一个脚印。”

从此以后，干部学校就进入了正常教育阶段。这期间，学校里来了几位苏联顾问，骑兵队的顾问的名字第一个音节译音是“文”，我们就叫他文顾问。这些顾问专教军事技术，不谈政治。不久，校长陈琢如另有任务，换了丁汉民来当校长。大约到了十一月间，丁校长召集全体同学，传达冯督办的命令说：从前军官学校学生都有一个入伍期，干部学校学生也要有一个入伍期。因为学生毕业后要带兵，带兵必须知兵，入伍当几个月兵，是知兵的极好机会。现决定从即日起，将全体学生分送到同兵种部队入伍，都要插到棚子（班）里，与一般士兵同生活同操练。于是，我们便入伍当兵了。我入的是骑兵第二旅第四团重机枪连。

入伍不入，便发生了国民军对奉系军阀直隶省军务督办李景林的战争，学生们也随同所在部队投入了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也有一些伤亡。这场战争结束后，又于一九二六年元月，召集学生回校复课，由石敬亭担任校长，开始了基本战术和应用战术等课程的学习，以及艰苦的战斗教练。过了不久，冯将军忽然通电下野，经外蒙古到苏联参观游览，由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这时，张作霖和吴佩孚以冯玉祥离开部队，出国远游，认为是消灭国民军的大好机会，于是联合向国民军大举进攻。他们在占领天津、北京之后，沿京绥路北进，在南口一带同西北军展开了持久的攻防战。张、吴并勾结阎锡山出兵晋北，企图截断京绥铁路，包围歼灭南口、张家口一带的国民军。

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中，一面加紧教育训练，一面还担负着张家口的警备任务。由于督办张之江对这个学校的爱护和支持，以及当时的教育长何应时对军校教育有丰富的经验（他曾长期担任保定军校的步兵科长），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基本完成了教育计划，准备举行毕业考试。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南口正面守军因弹尽粮绝，无法支持，开始向西北撤

退。干部学校也随军西迁。第一步到了包头，在那里举行了毕业典礼，并将约一半学生分配到部队工作，其余二百余人开到后套地区的五原县。

冯将军在苏联得知国民军战败后退的消息，立即经外蒙古回国，于九月十五日到达五原。经过一天多的连续会议和紧张筹备，于九月十七日中午召开誓师大会。大会会场设在五原城内的一块空地，临时筑了一个土台子，算是主席台。在主席台上的有冯玉祥、于右任、孙岳、方振武、鹿钟麟、石敬亭以及随冯由苏联回来的共产党人刘伯坚和苏联首席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在五原的文武官员和驻军约万余人，包括我们干部学校学生，都参加了大会。会上于右任首先讲话，他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党旗授予冯玉祥。他说：“从今天起，国民军已经正式成了国民党的军队，必须实行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接着冯玉祥讲话，他首先宣布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声明率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他要求全军应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彻底整顿纪律，严格遵守命令，以期无愧于革命军队的称号。刘伯坚也以国民联军政治部长的身份在会上讲了话，大意说国民军作为革命军队，今后必须加强政治教育，使官兵都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大会之后，冯玉祥以国民联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了《九一七新生命》，作为全军官兵的守则，其内容是“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

为了在新形势下在军队中建立政治机构和开展政治工作，冯将军决定以尚未分配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学校毕业生为基础，建立一个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由骑兵第五师师长赵守钰兼任校长，政治部长刘伯坚兼任教育长。这个学校设在五原县南门外县立高小的校舍内，因为这个学校房子不多，房子都作宿舍了，讲课只

好在院子里，放一张单桌，算是讲台，学生们席地而坐听讲。主要课程有：国民军历史，冯将军讲；国民党历史和《三民主义》摘要，于右任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国民革命的任务，刘伯坚讲；苏联军队的政治工作，乌斯马诺夫讲；《帝国主义论》，苏联顾问谢里给也夫讲；国民党党章党纲，王一飞讲。

冯将军每星期到校讲课二至三次，每次讲半天时间。他主要讲他参加的辛亥滦州起义，在四川参加护国讨袁之役，讨伐张勋复辟之役，在武穴停兵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以及首都革命等等，表明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今天正式参加国民党和从事国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当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主持教育工作的又是共产党人，所以学校中革命空气相当浓厚。学生经常高唱《国际歌》，也唱《国民革命歌》（即“打倒列强”歌）。学生们分成小组，每天晚上分组讨论当天所学的课程，每星期开一次小组生活会，按照报告、讨论、提议、批评等程序进行会议。在结业之前，学生们都填写了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但到结业时还没有发下党证。同学中有些是在入干部学校以前就加入过共产党或共青团的，他们这时也在半公开地活动。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是否吸收了新的党团员，我不了解。

这个学校上课约有两个月，就宣布结业，把学生陆续分配到各部队去开展政治工作。

三、入陆军大学前后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被分配到国民军骑兵第五师赵守钰部作了短时期的政治工作，后来被调到骑兵第一师田金凯部当上尉参谋，一九二七年四月被调为该师第三十八团少校团附，这年冬天

又升为中校团附。在这期间升迁很快，是因为国民军当时扩大得快，而有文化的军官比较缺乏，所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毕业生就被一步步提拔上来。当时我们这一师驻在陕、甘交界，负责保护后方交通，未能参加大战。由于当时国民军部队有三十余万之众，而陕、甘两省又比较穷，所以那几年部队都没有发过饷，而是每过三、四个月，来一次“奉命借款”，即由总司令部下令，借给士兵每人二元，官佐不分高低，一律借给五元。但粮秣和被服鞋袜等都按时发放，做到衣食无虑。官兵因为受到革命教育，觉得前途光明，精神上还是很愉快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奉军退往关外，战争随之停止。到了八月间，冯将军决定在南口举行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通令各部队派代表团参加。骑兵第一师师长田金凯派我为代表团团长，率领各团中下级军官十余人前往参加。我们第一步由陕西到郑州警备司令部报到。当时冯将军的总司令部在开封，他指定郑州警备司令部负责招待各部队代表团。那时郑州碧沙岗阵亡将士公墓正在兴建，有一天警备司令许骧云特在碧沙岗工地招待各部队代表吃野餐，当场致欢迎词。他说：这个公墓是由铁路货运附加捐中拨出二十万元兴建的，现在它是在远离市区的郊野，但是几十年后，这里将会成为市区的中心。

我们各部队的代表，乘一列军用专车到了南口，大家就住在车上。

追悼会是在南口车站东边的空地上举行的，临时搭有一座戏台作为祭坛，台上放有阵亡将士灵位和挽联、花圈等。因为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名军事首领正在北京开会，所以冯将军特别邀请蒋、阎、李等参加大会。届时蒋、李二人都来参加，只有阎锡山托故未到，这是因为阎在南口战役时，还参加了张作霖、吴佩孚方面出兵晋北同国民军作战，所以他不便参加这个追悼会。开会时，重要军政官员都登上台子，各部队代表

则站在台下。大会由鹿钟麟主持。在向阵亡将士灵位行礼，鹿钟麟报告南口战役经过之后，冯将军发表了讲话，大意是：我作为阵亡将士的“孝子”，在这里追悼他们，心中感到无比悲痛！他们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优势敌人的。当时我方不仅枪炮较少，弹药缺乏，而且粮食困难，有时连小米都吃不饱肚子。官兵以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浴血奋战达四月之久，他们的牺牲是多么壮烈呀！我军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向西北撤退。我们这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应该感谢由两广出发的北伐军，他们作战英勇，进展神速，吸引敌军主力南下，使敌人没有力量对我军穷追，我们的力量得以保存下来，绕道甘、陕，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我趁此机会，代表第二集团军全体官兵，向蒋、李两位总司令表示深切的感谢……接着蒋介石和李宗仁都讲了话，对阵亡将士表示哀悼，对国民军作战英勇顽强表示赞扬。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冯将军已拥有军队三十余万和鲁、豫、陕、甘、青、宁六个省的广大地区，他深深感到无论整理部队和建设地方都需要有众多的专门人才。而在他的部队中，比较有文化基础的，要数我们干部学校出身的一些人了。因此，他于九月间下了一道命令给各部队，召集干部学校毕业人员到开封报到，准备分期分批送往国内外高等学校深造。当时除了因原单位工作需要，确实离不开以外，到开封报到的共有一百余人，我是其中之一。

过了不久，北平陆军大学招考第九期学员，要第二集团军举行初试，录取二十人送北平参加复试。经过两次考试，我均被录取，遂于十一月间进入陆大。第二集团军被录取的共有九人，其中除一人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以外，其余八人都是我们干部学校同学。入学以后，冯将军规定每人每月发给我们生活费六十元，按月向第二集团军驻平办事处领取。这在他看来，给我们的待遇已经是很优厚了，但其他部队送来的人，都是按官级发饷，最少的

也在百元以上。但我们已经过惯了俭朴生活，每月六十元已经心满意足了。

一九三〇年发生了蒋介石与阎、冯的中原大战，结果阎、冯失败，冯的部下纷纷投降蒋介石，六省地方也丧失净尽，冯本人被迫隐居到山西汾阳。从此以后，我们的薪饷改归南京军政部发给。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们在陆大第九期毕业了。由第二集团军送来的九个人，除了张祖璞在学习期间病故，杨汝杰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我们毕业时经全体同学向张学良具保状，批准将杨汝杰释放）未能毕业以外，其余何章海、崔贡琛、孙日敏、王荣庆、卢焕辰、杨遇春和我共七人，决定先到汾阳看看冯将军，另有干部学校同学王际通，是由方振武保送来上陆大的，也愿意同去。于是我们八人，于十二月上旬经太原到了汾阳。冯将军当时住在汾阳城西北的峪道河，这是一个山沟，中间有一道小河，当地农民利用这条小河的落差，修了一些水打磨，冯将军就利用水打磨的磨房改作住房。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连声说：“你们下学回来了，很好，很好！”并一一亲切握手。他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然后说：你们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学习，这是很幸运的。我自幼失学，后来虽读了一些书，终究是片片断断的，知识不够，才遭到失败。但我并不气馁，也不悲观，还是要继续革命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我们能看着不管吗？不把他们全部赶出去，决不罢休！我今年才五十岁，按我的身体来说，干到八十岁是不成问题的。你们正在青年，更应该继续学习，努力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贡献。

谈话之后，他留我们一起吃午饭，每人一碗大锅熬菜，就以磨盘作饭桌，围着边吃边谈。饭后进行了个别谈话。和我谈话时，他先问我：“你看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说：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不应该急于争夺中央政权，而应该把

主要力量用在整理部队和建设地方上。一方面加强部队的装备和训练，一方面搞好地方治安和提高生产能力，如此下几年功夫，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就不会遭到去年那样的失败了。”他又问我：“你看今后应该怎么办？”我说：“今后应从政治上着眼，以团结抗日相号召，争取自己的旧部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促成全国抗日战争的早日实现。”他说：“你说的很对，希望你今后有何意见，随时提出来。”

个别谈话以后，他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谈话。他说：“咱们这里还有一个军官学校，李兴中是校长，支应遴是副校长，有学生六百余人，你们如果愿意留在这里，就先到军校去当教官，如果不愿意留在这里，也不勉强。”接着何章海说，宋哲元约他到第二十九军工作。孙日敏说，张印湘约他到第三十军工作。冯将军说：“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军原来都是我们的队伍，你们去帮助他们很好。”剩下我和崔贡琛、王荣庆、王际通、卢焕辰、杨遇春等六人，都表示愿意留在汾阳。我们回到汾阳城里，在送走何、孙二人后，就到汾阳军校去当教官。过了不久，有同学约王荣庆去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工作，他也走了。

这年十二月间，日军进犯上海，全国人民要求奋起抗战，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呼声下，他玩弄以退为进的策略，来了一次假下野。汪精卫、孙科等联名电请冯将军速到南京，“共赴国难”。冯认为蒋介石当真是知难而退了，决定即行前往南京。这时崔贡琛、王际通、卢焕辰、杨遇春和我，也认为冯将军东山再起的机会已经到来，连夜写了一篇《对日作战计划纲要》，送交冯将军参考。这篇《纲要》的大意是，把全国划为几个国防区，立即发动全面抗战。

冯将军由峪道河先到汾阳城内，首先对汾阳军校官长学生讲了一次话。接着汾阳县各界群众数千人，开了一个“欢送冯焕章

先生出山领导抗日大会”。首先由一位中学校长致欢送词。冯将军也即席讲话，大意说：日本帝国主义欺我太甚，占了东三省之后，又进攻上海，我们的国家民族确实到危急存亡之秋了。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应当奋起抗日。我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欢送大会开过之后，冯将军就离开汾阳，前往南京。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对进犯的日军作战后，冯将军由南京打电报给汾阳军校副校长支应遹，调我和崔贡琛、王际通三人迅速去南京。我们到达郑州时，听说南京受到日本海军的威胁，国民政府正在迁都洛阳，有几列火车停在郑州车站。我们三人进入车站打听，恰好碰到冯将军乘坐的火车，我们上车后，继续开向洛阳。在洛阳停留了一天多，汪精卫、李济深、冯玉祥等感到洛阳诸多不便，决定仍回南京，只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坐镇洛阳，把洛阳作为战时的“行都”。在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冯将军把我们三人叫到他的房间里谈话，当时他和李济深先生同在一个房间，冯将军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李任潮先生，是你们陆大的前期同学，李先生同我们一样，是坚决主张抗战的。李说：军事大权仍为何应钦所把持，蒋介石在后台操纵，除张治中帶了一些队伍到上海参战以外，其余都按兵不动，看样子他们还在打算妥协投降，上海战局不容乐观。冯说：“看看情况再说吧，我们现在是插不上手。”

火车到了浦口以北的浦镇停下，那些要人借浦镇铁路工厂办公，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就住在火车上。过了不久，蒋介石借淞沪抗战的机会，宣布复职。冯将军料定他仍将妥协投降，决定不和他见面，毅然乘坐一列专车，向北开去。到了徐州，他在火车上召集秦德纯、邓哲熙、陈继淹以及崔贡琛、王际通和我开了一个小会。他说：蒋介石回来，又要对日妥协投降，继续贯彻他的